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2.002

论《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治理思想的三重维度

李婉露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治理思想。恩格斯从“生产—社会—思想”三个方面把握生态问题,发起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恩格斯生态治理思想蕴含着生产工具、社会制度、生态伦理思想三个维度。恩格斯的生态治理思想在当代中国得到了践行。这是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时代结晶,既为世界的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中国道路。重温《自然辩证法》有助于深化对当下中国生态治理成就的理解与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生态治理;生态问题;自然辩证法;恩格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2-0008-08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LI Wanlu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1731, China)

Abstract: Engels expounded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Dialectics of Nature*. He addressed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roduction, society, and thought" and launched a comprehensive criticism against capitalism. His ecological governance idea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production tools, social system and ecological ethics. This thought has been practic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not only provides a Chinese plan for the progress of the world, but also provides a Chinese roa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Reviewing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will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current achievements in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Keywords: ecologic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problems; *Dialectics of Nature*; Engels

生态问题与生态治理,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中必然面对的问题,缠绕人类社会已久。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生态问题的看法千姿百态,生态治理的思想与实践也各不相同。但是纵观历史,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对生态问题与生态治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解。这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展现。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通过深入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困境,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治理思想的建立提供了思路与范本,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治理思想,在中国得到实践与创新,既为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路,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创新。

一、生态问题的产生: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回答

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恩格斯与当今人们一样,面对着各种生态问题。虽然问题的表现形式、发生领域不同,但本质上是殊途同归。“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72},生态问题终归于人。而人则兼具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两种属性,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源于作为自然,应当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人却将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将自然视为有异于己的存在,过度开发自然,妄图征服自然,由此招来了自然的报复,遭遇严重的生态问题。人的两种属性的对立因而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此,恩格斯着眼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揭示出生态问题

收稿日期:2022-11-23

作者简介:李婉露(1999—),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产生根源,对其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

在《自然辩证法》开头的“计划草案”中,便已显露出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是恩格斯1878年为《自然辩证法》制定的计划,详细规划出本书的结构。“计划”的开篇第一条便是“历史导论:在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观点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2]3}。恩格斯看来,《自然辩证法》首先应当拥有的是“历史导论”而非“自然导论”。因为自然并非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神秘客体,也非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物自体”,自然不是作为自在自然而存在,而是与历史的人一道生成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

人化的自然与人息息相关。这首先表现为自然随人类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历史的变化。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越是发展,自然展现出的形态与属性也就越是千变万化。面对自然,古代的人无能为力,只好将自然力量奉为神来崇拜;近代“数学、力学和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等领域取得新成就,让人得以静观自然,注意到“自然界在空间的广延性”^{[2]6};随着地质学、生物学、有机化学等方面的突破,人类社会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发现自然并非仅仅是静态的自然,自然同样是历史性的,是不断演化发展的。如恩格斯所说,“旧的目的论被抛弃了”,自然的新面貌以“物质在其永恒的循环中是按照规律运动的”方式展现^{[2]7-8}。从神秘的混沌之力到作为空间的广延再到时间的绵延,恩格斯以历史的眼光看到了自然样貌的不断演化,并点明这种演化之关键动力:自然科学。

自然与人的动态关系具像化,表现为自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是人研究自然的透镜。在科学的层面,自然科学的分科发展,让自然分别以物理、化学、生物等形式呈现自身;而在哲学层面,自然科学背后的世界规则让自然以“旧的目的论”或“按照规律运动”的形式展现,所以说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关于自然的旧的“形而上学观点”已被淘汰,“站不住脚了”。

正如自然不是作为自在的自然,同样,自然科学也不仅仅是其自身,独成一体,而是人的自然科学,具有社会历史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28},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命题道出了关键。自然科学并非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科学,集中体现在生产方面。

因此,对有关自然的问题的分析,应当深入社会历史的层面。而这也是何以“自然辩证法”拥有一个“历史导论”的缘故。

自然与历史是辩证统一的,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囊括自然的历史,正如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人的辩证统一。所以,《自然辩证法》开篇好似在讲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谈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斗争,探讨自然科学对形而上学的瓦解,殊不知恩格斯已深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社会生产,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探讨关于自然的问题。

具体而言,在恩格斯看来,由于科技这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旧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日耳曼语各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2]9}。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人类得以冲破大洋的阻碍,发现新大陆,完善对自然的认识,并摧毁“教会的精神独裁”,还权于市民社会。科技带来的社会、思想成果又为下一轮生产革命作准备。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现代大工业”,在作为理论性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力,而这种理论的发展又反作用于社会历史,提高工业水平,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由此可见,在“生产—社会—思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位一体”滚滚向前的过程中,自然与自然科学的表面关系得到更加深入与具体的展开。“现代自然科学……发端于市民等级摧毁封建主义的那个伟大时代”^{[2]5}。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自然科学与自然的关系之后,是人类社会历史与自然的紧密关系。“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2]329-330}。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首先受制于经济情况,人首先是“经济学家”,在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当中生活,其次才作为“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萌生出有关自然的思想理论。

从本质上讲,生态问题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问题的产生并非自然独立自在运行的结果,而是在与人的交互关系中产生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充分剖析,说明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生产—社会—思想”渊源。

从表面上看,生态问题的出现是自然科学的恶果,居里夫人的成果变成了原子弹与核污染,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成了全球变暖的推手,帕克斯的塑料换来了海洋生物的窒息。这一切似乎都怪罪于科学。

但恩格斯已讲明,人首先是“经济学家”,其次才是“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所谓科学造成的生态恶果,实际上是出于更为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生态问题的本质是历史问题。具体而言,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生产—社会—思想”三个方面把握生态问题,发起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其中所蕴含的解决路径——生态治理思想因此具有生产工具、社会制度、生态伦理思想三个维度。

二、生态治理思想的生产工具维度

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方面。这也就决定了其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如前所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社会历史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作为生态治理的首要方面。但在生产这一范畴之下,又涵盖了诸如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生产者等方面。究竟何者可以作为生态治理之切入点?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给出了回应。恩格斯在对劳动作用的分析中,点明了生产工具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工具对于劳动而言必不可少。“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309}。制造生产工具是劳动的起点,而劳动则对自然加以改造,生态问题在此过程中产生,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生态问题,则应从源头上的生产工具入手,厘清生产工具的地位与特性,进而掌握生产工具与生态问题的关系,为生态治理提供出路。恩格斯正是这样做的。生态治理的生产工具维度由此显现。

恩格斯开篇就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2]303}劳动不能脱离自然界,自然界以“材料”的中介形式与劳动相连。在劳动的过程中,人借助自然所提供的“材料”进行生产活动,既使用“材料”创造“财富”,又将“材料”转变为“财富”,“材料”既以作为用品的生产工具形式出现,又表现为生产的原料与产品。在此,前者具有关键地位。因为生产工具是劳动借以发生的用具—中介,将人与作为原料的“材料”相联结,仅凭劳动而无工具,则只是一种空想,无法与自然界发生联系。

但在本节中,恩格斯指出劳动超出生产财富的作用,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03},恩格斯在具体论述中是从手的发展开始的,手属于人体的一部分。那么是否是说劳动不需要生产工具便可以发展作用?是否是对“材料”的推翻?不。手在此是具有二重性的。手既作为人的一部分而存在,又作为生产工具参与到劳动过程中。当人不劳动时,手作为人体之构成,当人劳动时,手便作为生产工具进行生产活动。当新的生产工具出现时,手便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因此,生产工具不仅是用具—中介,也是劳动的凝结与成果。生产工具渗透于劳动的全过程、全方面。

在恩格斯看来,从猿过渡到人的整个过程中,手都以工具的形式出现。手先是作为生活工具,例如先作为猿的攀援工具,再以“双拐”的形式出现作为猿的行走工具,进而承担更多的活动^{[2]304}。其次,手进化为了生产工具,用于生产新的人工的工具。“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若只是将手作为生活工具,而不作为生产工具,那么也就没有劳动这一环节——因为劳动始于工具的制造——猿便无法进化到人。生产工具不仅对于劳动而言,对于整个人类而言都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意义。

通过生产工具的创造与革新,人得到了进一步解放,石刀的制造让“手变得自由了”,所以恩格斯认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新的工具替代了手相应的工具功能^{[2]305}。这一切的成就都得益于最初作为生产工具的手。“凡是有益于手的,也有益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以二重的方式发生的”^{[2]305}。手服务于人的身体,手的运用促进从猿到人的转换。而人又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有益于人的也就有益于自然。“手—人”的关系上升为“手—自然”的关系,“手”——生产工具——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至关重要。

随生产工具的发展,即“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组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2]306}。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工具作用于人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生产工具一方面使人的主体性凸显,促进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增强人的主体性意识与地位,为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行动奠基;一方面使人团结在一起,强化主体间性,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主体,而是结成社会的群体主体,以群体的方式面对自然。“人对自然的支配”由这两方面得

以强化。生产工具中的主客体关系,人与自然二分的视角让人与自然陷入“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为生态治理提供了思路与着力点。

对于这种主客体关系,恩格斯同样在文本中有所涉及。“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2]307}。工具总是属于一个主体的工具,“感觉器官”属于“脑”,“脑”运用“器官”,“器官”在此过程中发展起来,“脑”也同样得到发展,这二者推动作为类的人前进。人自然而然成为生产工具的主体。如同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主体与客体同样的辩证统一的,主客体同时呈现,不存在没有客体的主体,也不存在没有主体的客体。人既由生产工具成为主体,必然将生产工具以中介的形式作用于一个客体,自然就成了这个客体。作为客体的自然被作为主体的人“支配”——以生产工具为武器。由此涉及到的不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及其地位,更深层次地关涉了生产工具的使用及其作用。

在使用过程中,生产工具出现了分化——无机的生产工具与有机的生产工具。前者以石刀等工具为代表,而后者以动物为代表。人训练动物为自己所用,如用牛耕地,让“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2]309}。人的主体意识在这种使用过程、奴役关系中得到强化。意识总是对存在的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在这种奴役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意识附上了奴役意识的性质,并在生产中表现得更为强烈。恩格斯指出,能作出劳动计划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就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劳动了”^{[2]311}。人对动物的奴役上升为人对人的奴役。人的主体性意识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也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封建时期,而这种人对人的奴役,将人本身作为生产工具来使用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基于对生产工具本身的地位以及使用状况的分析,恩格斯发起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工具的滥用是造成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人消灭植物”为“腾出土地”以“得到多倍的收获”,“把各大洲动植物的生活都改变了”,而且动植物“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2]312}。在资本主义中,借助更新的生产工具,生

产规模得到扩大,资本家不顾生态环境,“消灭”自然的造物,追求对金钱的“收获”。更为严重的是,对生产工具的滥用造成了自然自身的异化,即“认不出”自然的原样。人与自然的对立在资本主义中达到高峰,人企图将自然完全地“人化”。这种“人化”与人化自然不同,这种“人化”将“支配”欲望发挥到极致,目的在于“支配”自然,而人化自然则是指受人类影响、为人类认识的自然。恩格斯再一次强调“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既是人区别与动物之“本质的差别”,又是凭借生产工具得以发生的劳动的结果^{[2]313}。

恩格斯指出了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之基础的生产工具被滥用的恶果。资本主义对生产工具的滥用,让森林成了“不毛之地”,毁灭“高山畜牧业”,引来雨季的“洪水”,使“瘰疬症”四处传播,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招致了“出乎预料”的后果,抵消了已实现的“预期的结果”,“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313}。滥用生产工具虽然为资本家带来了利益,但出于其基础性的地位,引起了生态环境全面的连锁反应,生态问题不断涌现。在自然的“报复”中,自然与人的主客体关系颠倒了过来,自然向人类展现其不可抵挡的力量。这种“报复”不仅打击了人的主体意识,而且是对生产工具现形态与运用的否定。生产工具带来了生态问题,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生产工具的合理性因此值得深思,生产工具的资本主义运用与合法性被自然无情地否定。恩格斯在“导言”中便已道出了生产工具不合理使用的未来:“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2]22}

通过厘清生态问题,恩格斯生态治理思想的生产工具维度得到深度的显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生态治理之源始与根本之处就在于生产工具。通过辨明生产工具对劳动和人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了生产工具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指出其所具有的主客体关系框架。主客框架本身只要对其善加利用,便可以避免生态问题的恶果。然而,具有基础性地位的生产工具,带着其主客框架落到了资本主义手中,便被资本主义滥用,使得生态问题大为突出。

因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生产工具维度上,为当今生态治理所提供的思路主要有两个切入点。一是生产工具本身。生产工具在设计与制造上,应注重生态友好性,打破旧有的主客对立视角,让生产工具源自自然之“材料”又回归自然之“材

料”,即促进自然生态的发展与保护。人出自自然,与自然一体,作为核心与基础的生产工具同样不能以“统治”“支配”为理念来进行设计,而应在一体性、和谐观念的指导下进行,从而实现生产工具的生态迭代,制造出真正环保的工具。二是生产工具的使用。生产工具的使用应符合生态规范,不能以权谋私,避免生产工具的滥用,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征服性与支配性的使用。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313-314}。

但恩格斯并未止步于此。恩格斯虽已发起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这里主要围绕资本主义对生产工具的运用而展开,还未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人越成为人而非动物,人对自然的影响就越体现出目的性,越有着“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2]312}。生产工具滥用的背后,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在驱使。紧随生产工具而来的是社会制度维度。

三、生态治理的社会制度维度

生态治理从字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制度则是人与人的关系。生态治理如果仅着眼于前者,则有陷入片面、抽象思维的风险,因为对于人不够了解,也就无法精准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影响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生态问题因而是社会问题的反映。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论述中看来,社会制度影响着人,从而影响着人看待自然、解决生态问题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增值是统治阶级的第一追求,在资本的导向下,自然所具有的只是服务资本的属性,生态环境与自然材料都是可资利用的资源,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停留于资本的关系,生态治理变成了资本治理。在社会制度层面,生态问题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牟利制度的扩张导致生态问题,所以,生态治理在此维度不能仅从社会制度内部的改革入手,而应实现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说:“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315}在改变了“整个社会制度”之后,才能从资本治理中跳出,实现真正的生态治理。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直接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批判,而这种批判则

蕴含着生态治理思想。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恩格斯一语道破其政治经济学玄机。资本主义“仅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恩格斯认为这是“愚蠢的”^{[2]74}。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对资本的追求。恩格斯认为,一切“物”都被等价变换为“劳动时间”,而这些“物”又有着源于自然界的“材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不再是作为总体的自然,而沦为资本手中的物,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构成。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中也变为了人与资本的关系。当自然褪去其本质后,便也不再与生态问题相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再也不用顾忌自然的“报复”与生态问题,对资本利益的追求不惜牺牲生态环境。

生态问题并非由于资本主义的漠视而不存在。相反,资本主义对生态越是蔑视,自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报复”就越猛烈。恩格斯举例到,1847年爱尔兰因土豆遭到病害,发生饥荒,“有100多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进了坟墓,并有200万人逃亡海外”^{[2]314}。资本主义社会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然要求降低生产成本,其中之一就是人力成本(工人赖以生存以及保障后代延续的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活水平仅仅保持在最低限度,土豆因其价格低廉成为许多工人赖以生存的食物。土豆被大规模种植,当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食物来源的丰富性被破坏,食物彼此之间的可替代性降低,食物逐渐单一化,因此对抗自然风险的能力也就降低。当自然“报复”人类时,生态问题产生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单一性、片面性便是一种强烈的打击。所以有了恩格斯所描述的爱尔兰的恐怖状况。

生态问题是人类社会问题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所遭受的生态问题反映出其社会制度本身的缺陷。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仅仅关心短期利益,“以取得的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忽视“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2]315}。在时间这一最为直观的形式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是重视短期利益,即“最近的”利益,忽视长期利益。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资本家与资本家群体的竞争,稍有落后就会有被对手超过、打败,甚至破产的风险,因此,资产阶级对资产增值的追求是极为紧迫的,这最直接地表现在时间方面。在短时间内,出于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与自身的阶级立场,“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

素”^{[2]315},资本家专注于资本的积累与竞争,调动一切为资本服务,由此导致对长时段远期状况的忽视。

生态问题正属于远期状况。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是自然界经过长时间演变形成的,长时间的积累加上自然界之广袤,使其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状况以及自我调节机制。当资本追逐短期利益时,即便一时排放过多的二氧化碳、污水,也不足以威胁、改变自然环境。但正如恩格斯指出,当这些行为在长时间中“重复和积累”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也日益增长,最终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产生于长时期,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对长远的忽视,忽略生态方面“较远的结果”。

生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不仅体现在直观的时间层次,也体现在知性层面的因果关系中。同时间的前后相继不同,因果关系中的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是逻辑的前后相继。在因果关系中,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关注直接的结果,忽视间接的结果,表现为对直接利益的追求。恩格斯指出,资本只关心“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甚至“产品的效用”也让位于“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利润是“唯一的动力”^{[2]315-316}。恩格斯阐明了资产阶级所进行的生产活动,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榨取剩余价值,促进资本的增值。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利润的获取,至于资产增值的间接后果都随同“效用”一道“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直接性的强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对间接性的无视为其招来了祸根。

首先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问题。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相对过剩,社会无法消化“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生产者大众”与“这些资料”相分离,从而造成了“十年一次的危机”,即对“这些资料”的“毁灭”以及对“生产力本身”的“毁灭”^{[2]300-301}。从历史事实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盲目追求利润,聚集社会财富,进而导致贫富两极的分化,让产品卖不出去,隔离了产品与“大众”,造成“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这种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追逐利润时所无暇顾及的间接后果。资本主义的逐利行为的直接后果是钱,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种社会问题。

之后是更为间接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由社会问题导致。虽然恩格斯在此未明确指出,但从他的言辞之间与时代环境之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对直接利益的追求使之将自然变成了资本眼中的

利益组成,自然被资本化了,这既浪费自然资源,又给自然带来污染,从两方面导致了生态问题^{[2]330}。资本主义对生产的盲目追求,让生产远远超出消费。在“十年一次的危机”中,资本主义所毁灭的产品污染了生态环境,如将牛奶倒进河中等行为破坏了河流生态环境。而且,这种生产过剩也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过度向自然索取“材料”,威胁生态平衡。这种间接之间间接的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眼光看不见的。

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又与社会问题构成了回旋式的螺旋上升结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最后谈到,资本家对“商品和买主”与“自然”的后续情况皆不关心,“西班牙的种植场主”焚烧森林,只为以“木灰作为肥料”,但之后的大雨却“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丧失财产”以及财产与社会的两极分化^{[2]316}。在恩格斯的论证中,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牟利,牺牲、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而这又在后续“报复”了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其所欲赖以发展的生产力,影响社会生产,引发社会问题。资本直接的逐利行为非但没有为其带来间接、长远的效益,反而引起了生态问题,生态问题又暴露并加剧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加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矛盾。而社会矛盾又凸显生态问题,两类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恩格斯说,资本主义的人们惊讶于“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2]316}。

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最为根本的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扬弃资本片面的逐利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与生态问题的连锁反应所预示的结局,就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2]315}。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就消灭了资本滋生的社会环境,从而避免了对直接性、短期性利益的追求,进而打破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的恶性循环。新的社会制度,应是实现了直接与间接、短期与长期利益辩证统一的社会,实现社会与生态良性发展、友好互动的社会。恩格斯说:要保护“产品和生产力”免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就要从资本家处夺权,让“生产者群众”掌权,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2]301}。

在此,已经透露出更深层次的维度,即生态伦理维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社

会与生态问题,而且也暴露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的逐利性。生态伦理问题的开显,既是对恩格斯思想的阶段性总结,又是对下一维度思考的开启。

四、生态治理的生态伦理思想维度

逐利的行为蕴涵逐利的意识,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与认识关系的思考。对于生态问题的分析,不能仅停留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而应以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分析为地基,深入到思想观念这一逻辑后承的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思想观念的问题最明显地承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恩格斯在结尾处指出,与其“社会组织”相适应,“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只关注“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影响”^{[2]316}。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表现出逐利性,而这仅仅是其思想体系的一个代表,后者在生态伦理问题上选择的是“利”而非“义”。为批判资本主义在生态伦理上的问题,恩格斯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问题,即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实践与认识的割裂、唯心主义世界观。

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哲学”,都“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割裂地看待“自然界”与“思想”,未能认识到“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因此他们只知道自然对人的决定作用,不知“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2]198}。在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中,人对自然的作用被忽略了,仅存自然对人的作用。在人—自然的关系中,人将一切现象都归结于自然。当生态问题来临时,人不认为生态问题是自身行为的后果,反而认为这是自然“主动”发起的。资产阶级认识不到人—自然的具体关系,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对生态问题进行反思,难以从源头解决生态问题,进行彻底的生态治理。

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认识,首先由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方法论的片面性。恩格斯指出,由于将必然性与偶然性当作“永远互相排斥的”,所以科学家们认为“种的有决定意义的性状”是“必然的”,而个体间的差异则是“偶然的”^{[2]192}。在这种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指引下,自然科学只看到“种”的普遍性,忽视属于“个体”的特殊性、丰富性。而科学就其自身来说,就是从特殊的现象中提取普遍的规律,从多样中发现统一,从偶然中发现必然^{[2]115-116}。科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本应结合具体的现象、事实,对之加以提炼。但在形而上学方法的

影响下,具体的现象都被作为“偶然”而抛弃。资产阶级科学的出发点便从偶然变成了必然,从必然出发追求普遍。恩格斯总结道:“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便停滞不前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2]192}对于资产阶级科学而言,偶然的、个别的自然(生命)便不再重要,只有必然的、普遍的自然能够成为科学的对象,但对这种自然他们又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内容,因为其中的个别与特殊已被作为偶然而抛弃。资产阶级科学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凡是必然的都是普遍的。这就表现在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们对“力”这个概念的滥用上。在物理学研究中,他们发现了“力”的概念,作为必然的“力”既是他们构建理论大厦的基础,又是一个普遍到四处皆可的概念,因而导致了“力”的滥用。“力”已经跨出了无机界进入到有机界。恩格斯指出,力“在有机界中”是“不够的”,但却仍在被到处使用,出现了“肌肉力”“神经力”等“荒谬”概念^{[2]159}。形而上学方法为资产阶级科学思想带来的是基于普遍必然性的独断主义,在此表现为“力”的独断。“力”统治了无机科学与有机科学。

资产阶级的这种对“普遍性”概念的独断与滥用,不止局限于自然科学内部,而且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们,将达尔文关于“自然界的史”的“生存斗争学说”生搬硬套到“社会的历史”当中,但不能将其作为“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2]300}。资产阶级对达尔文主义的生搬硬套,以生物学的范式解读社会历史发展,虽然符合了“自然科学”,但却不知变通,忽视两种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进而忽略自然科学范式与社会科学范式的差别。在这种生物主义历史观看来,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是偶然的特殊的,“生存斗争”是必然的、普遍的。在资产阶级的这种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中,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均泯灭于“生存斗争”中。“把历史看做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内容丰富得多,而且深刻得多”^{[2]301}。因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被剥离了具体性、历史性,因此难以真正实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进而阻碍对社会—自然关系的认识,剥离了生态伦理的维度。

恩格斯指出其关键,对“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遗忘,阻滞了“自然科学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2]311}。无论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方法论的表现如何,在其对必然与偶然的割裂、对普遍性的独断与

滥用中,都表露出了同样的片面性。在这种带有片面性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的理论思想看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不仅不明瞭社会—自然关系中的前者,更是难以琢磨自然本身,即“在自然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2]311}。自然界中丰富的联系被割断了,因而人的行为即使对自然产生影响,也只不过是局部的、暂时的,行为后果没有时空上的联系,对生态的影响微乎其微,更勿论生态伦理问题。

通过对资本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恩格斯进入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批判“力”的独断主义时,恩格斯讲:“生命力就成了一切超自然主义者的最后避难所。”^{[2]160}在面对自然问题的困扰时,自然科学家选择遁入超自然主义,成为其中一员。加入超自然主义的自然科学家们,在面对自然问题时往往采取越过(超)的态度,不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不对自身理论前提加以反思,最终只能得出神秘主义答案。对此,恩格斯说:“火在这里还完全被看做某种神秘的东西。”^{[2]279}自然科学本应是揭示自然的未知,探寻自然的奥秘,但却陷入了“超自然”的“神秘”的回答。“神秘”让自然又退居幕后,停留于未知状态。

对于科学难题,资产阶级科学家回答说“我对此没有认识,因此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所以“科学便停滞不前了”^{[2]93}。他们不认识的就不是科学的,不科学的便不必再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即便研究条件得到改善,他们仍然不会对那些“神秘”进行研究,单纯因为过去的“神秘”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这种向神秘主义的逃遁,显示出资产阶级思想对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的否认,即不可知论。对他们而言,自然是不可知的,只能用超出知识的理论解决,即神秘主义。在他们看来,既然自然从根上来说是不可知的,那么生态问题也只是自然神秘力量的一部分,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对之进行研究与反思,对神秘力量无

法考虑到生态伦理层面。

究竟为何科学走向了神秘主义?恩格斯通过分析得出了结论,即是由于“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这种经验最终受到辩证法的惩戒,走向了其反面,“陷入现代唯灵论”^{[2]58-59}。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科学极端的经验主义,导致其陷入直观—理性的对立,因而与一切“理论”与“思维”对立。这种纯粹的、极端的经验主义的科学在面对其解答不了的问题时,便只能求助于神秘的力量,最终滑向自己的反面——“唯灵论”。

而这种“唯灵论”又暴露出资产阶级科学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对于思维与存在之间第一性问题的唯心主义回答。“唯心主义世界观”支配着他们的头脑^{[2]311}。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认为,思维、精神、意识等等是第一性的,人的头脑决定着世界的样子。恩格斯点明,自然科学“把真实的关系弄颠倒了,把映像当做了原型”。^{[2]47}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认为自然是思想的投射,不是思维反映存在,而是存在反映思维。尽管有些自然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建树颇丰,坚持从经验事实中观察总结,但他们一旦遇到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就暴露出其唯心主义的本质。正如恩格斯观察到的,很多“自然科学家”在“自己的那门科学中”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而一旦在其之外,就成了“唯心主义者”,甚至是“教徒”^{[2]67}。不仅自然科学家如此,就连社会科学家、哲学家也是这样,费尔巴哈就是典型的例子。当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面对生态问题时,便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成为只会祈祷的“教徒”。

至此,资产阶级在思想根源上的问题被彻底揭露。由于唯心主义、对自然的不可知论以及形而上学方法论,使得资产阶级错失了对生态伦理问题的思考,在面临“利”“义”抉择时倒向了“利”,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生态治理之“义”。恩格斯提示了生态治理之道所应避免的问题与应当关注的焦点,即生态伦理。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